

甘肃唐代涉藏金石目录提要

吴景山¹ 李永臣²

(1.兰州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2.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导游系,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 散布在甘肃境内涉及吐蕃往事的唐代钟铭及摩崖碑刻,对于研究吐蕃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将这些碑铭资料做一简要介绍,以期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从而使之在藏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甘肃;唐代碑刻;钟铭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3-0068-010

唐代初年,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强大,其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亦日趋频繁。无论是吐蕃与唐王朝的姻亲同好,还是相互之间的兵锋交恶,甘肃作为青藏高原与中原之间的必经之地,留下了许多与吐蕃人相关的历史遗迹。至今散布在甘肃境内铸刻于唐代的钟铭和摩崖碑刻,为我们研究当年吐蕃暨藏族与内地的交往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坚实的史料依据。

尽管散布在甘肃境内涉及吐蕃往事的钟铭及摩崖碑刻,对于研究吐蕃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在堪称甘肃明代之前的金石碑刻大全、张维先生所著的《陇右金石录》中,虽然收录了《洮州钟铭》《石堡战楼颂》等涉及吐蕃史迹的资料四种,但其录文却漏录错误颇多,如其中收录的《李将军碑》本来是一篇记述碑主在今甘南藏区征战督抚生平的珍贵文献,由于磨蚀剥泐严重,碑面大面积残损,今存石碑文字经仔细辨读,尚可识者有471字,而张维录文则仅录176字。今存于临洮县城内,世人沿袭俗称《哥舒翰纪功碑》,由于碑面中部大面积剥落,张维先生在审读拓片时很有可能失仔细,以致将碑文上下两部分均差错一行录出,从而使碑文原意产生了很大的谬误。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有效使用这些碑铭文献资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鉴于此,笔者将所掌握的甘肃境内唐代的金石碑铭存佚状况、研究信息等,分别以提要的形式介绍如下,以期能使藏学研究者收到按图索骥之效,并让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永靖 唐仪凤 张楚金摩崖石刻(678年)

此摩崖石刻今存永靖县境内的炳灵寺第64龛上部岩壁上,碑面高160厘米,宽150厘米,刻文自右至左竖书共40行,满行42字。全文原有约1460字,因碑面年久风化剥蚀,字迹残损模糊,今可释读者仅有638字。从现存碑文可知,此摩崖刻于唐仪凤三年十月,刑部侍郎张楚金撰文,其内容基本为描述炳灵寺景色形胜之语。然观其刻文首行有“三日大军”字样。据《旧唐书》卷五《本纪高宗下》载,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秋七

[收稿日期] 2012-03-13

[作者简介] 吴景山(1954—),男,河北保定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李永臣(1964—),男,河北沧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月丁巳又得(李)敬玄表奏吐蕃入龙支,张虔勖与之战,一日两阵,斩馘极多。”九月“丙寅,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王师败绩,审礼被俘。上以蕃寇为患,问计于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备边不深讨为上策。”由是观之,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至三年(公元678年)吐蕃连续入寇龙支、鄯州、河源(今青海西宁、民和、乐都及甘肃临夏一带)等地,而炳灵寺则仅当其冲要之处,此文显然是在刑部尚书张楚金从军进讨吐蕃途经此地时所撰。这方石刻为我们了解当年唐朝军队的进军路线及征战的时间、规模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蛛丝马迹。此摩崖刻石在张维先生所著的《陇右金石录》中缺载。阎文儒、王万青曾著有《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一文^[1],对这方刻石做了著录和简要的考释。另外,张思温先生的《积石录》,王亨通、杜斗成合著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也分别对此方石刻做了介绍。然各家录文均有出入,现谨将张思温先生在《积石录》中对这方刻石的跋文按语介绍如下。

此文刻在第64号窟旁,上宽144、下宽142、右高147、左高145厘米,共41行,每行43字。界以方格,行楷劲丽,为炳灵寺石窟现存唐刻之最。第剥蚀太甚,不能施拓,照相亦不显。1963年8月28日,同阎文儒、乔今同、耿刘同等往游,阎等登梯轮流认读,我在崖前写记,其18行至24行不及辨识,缺焉。1957年7月24日,与王万青、王世哲再次登览补识。1982年10月9日,又至炳灵寺审视一周,王武元、孟黎明为之协助,又作补正,如上所录。

张楚金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新旧《唐书》均附见《张道源传》。旧书称为源族子,新书称为道源族孙。《旧唐书》云:“楚金少有志行,事亲以孝闻。初与兄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时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若此,何嫌双居也。’乃俱荐擢第(《太平广记》卷二零二亦载此事,云出《谈宾录》)。楚金高宗时累迁刑部侍郎。仪凤年,有妖星见。楚金上书,极言得失。高宗优纳,赐帛二百段。则天临朝,历位吏部侍郎、秋官尚书,赐爵关内侯。为酷吏周兴所陷,流配岭表,竟卒于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绅诫》三卷,并传子时。”《新唐书》略同,并称其“有清概,然尚文刻,当时亦少之。”此文撰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即楚金为刑部侍郎之时。

仪凤中,唐与吐蕃互攻伐,据史书载,自仪凤元年闰三月,吐蕃寇鄯、廊、河、芳等州(今青海省东部和甘肃省西南部),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凤(陕西汉中及凤县)兵以御之。乙酉,以周王显为洮河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12总管;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以讨吐蕃。二王皆不行。吐蕃继寇叠州、扶州(甘南一带)。遂于二年八月,命刘仁轨镇洮河军,诏大发兵讨之。三年正月,刘仁轨以每有奏请,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所抑,怨之。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战守,非敬玄不可。遂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今四川)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四川及陕西南部)兵以赴之。九月丙寅,李敬玄将兵18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敌所攻。敬玄怯懦,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屯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吐蕃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率敢死之士500人袭击敌营,敌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摘《资治通鉴》)。此文作于10月,文中有“三日大军”“侍郎张楚金”“属李令公将军”(李敬玄曾任中书令)及“戊寅(仪凤三年)九月乙卯朔二十七日辛巳”等语,按二十七日距丙寅(十二日)兵败越十五日,敬玄已还鄯州(今青海西宁)。楚金以事至此,遂游灵岩而作此文欤?

楚金所著《翰苑》等书,在我国早已失传。日本太宰府天满宫(在福冈市东南)尚存有抄本第31卷一册。公元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旅日学者罗振玉曾见日本所藏我国唐代抄本古籍数种,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喜直等商洽影印,并致函托其出售在日住宅,得价以助印书之费。后于1922年(日本大正十一年)印成,此书即其中一种,狩野在1921年(辛酉)题记中曾言其事,并附刊罗之原函。(内藤虎跋称,此书原为筑前男爵西高迁氏藏,不知与天满宫现所藏者是否为一?)这是中日友好的美谈,也是文化交流的盛事,今得此文,可谓不孤矣。

《翰苑》第30卷影印本每面正文7行,每行15字至17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每行二十二三字不等。共42页(83面)订为一册。首题“翰苑卷第三十。张楚金撰。雍公叡注。”第二行以下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三韩、高丽、新罗、百济、肃慎、倭国、南蛮、西南夷、两越、西羌、西域‘域’、后叙”等16目。其中西羌、西域两

门原缺,文皆用骈语,如《匈奴》一章首云,“周称玃狁,焦获致三捷之功;汉曰匈奴,平城表七重之晕……”每句下均有详注,可裨史实。据《后叙》言,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十二日昼寝感梦,遂著是书。则属稿早于此文18年矣。

此碑也是一种骈体文,虽残缺过甚,余字可辨者不足一半,然其意仍可寻绎。文之题目仅“记”字可见。《记》言,大军在黄河以北,张楚金到时。南岸以东秋稼盈畴。李敬玄派人迎邀,于是登阁道入灵岩寺。河旁石门险狭,寺在积石山,为夏禹导河施工遗迹。继述炳灵寺狭中崖壁峙削,林木泉霞之胜,及寺庙佛窟建造之美。西则红砂岩朱紫彬驳,焕若仙人之居;东有长若干丈,广十余步之土坡,黄土细润,没有砂砾,修营房舍为道士栖居之所。与今石窟和对面保管所住地相合。以下又叙,张楚金于戊寅(仪凤三年)九月二十七在积石山灵岩寺斋戒礼佛之事,并描写溪水万转,绿树障天,触景生情,肃焉起敬,尘虑一清。联想到张载的剑阁勒铭,孙绰的天台作赋。乃解衿禅院,焚香饮浆,与道士谈禅证理。“斜景将颓”以下,叙天色已晚,率从人取道寺北返回。沿路小径磴道,草深树密。路狭处只宽丈余,且在高涧之中,十步五步之间,流水曲绕路径。以下更叙,积石山之峰岩秀疏,万象千容,丹黄苍翠,深峭幽险之状。“身亲北而下”一段,则叙归途回望,风烟阻嶂,曦光隐耀,遥想梵歌兢发,佛殿氤氲,赞颂供奉之盛,堪称妙境。文内所叙道路、建筑、山势、地形皆合实际。熟于炳灵寺环境及故事者,不难度而得之。

碑文还有应该提出的,如“张景阳之薄游剑阁,勒铭山阿,孙兴公之运想天台……”张载,字孟阳,安平(在今山东)人,父为蜀郡太守,载于晋太康(280年至289年)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而著铭。益州刺史见而表上其文,晋武帝命镌之剑阁山。孙绰,字兴公,晋时太原中都(在今山西)人,作《天台山赋》成,示友人范荣期云,“试掷地,当作金石声。”此二文皆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其后成书于唐初的《晋书》及《艺文类聚》以及明时所辑《张孟阳集》,均有《剑阁铭》以为张载所作,“勒铭山阿”即此文尾语。张景阳名协,是张载之弟,与载齐名。但此铭非其所作。张楚金作此记时距张载作铭不过400年,史如不讹,当是一时记忆错误。其二,“灵荒下青莲之峰,烹浆……”荒,应是“蔬”的别写异体字。炳灵寺山上旧多野菜,而附近原来草木丰茂,羊肉羊汤自然也好吃。其三,它如“虎牙”以避讳而作“武牙”。“竹术”、“松磴”,是路边的毛竹、磴道的长松,在以前炳灵寺草木茂盛时确是如此,“赭岩素壁”,“翻黄拖翠”,现在还可仿佛见之。

二、永靖 唐开元 灵岩寺记摩崖石刻(731年)

此摩崖石刻今存永靖县境内的炳灵寺第64龛上部岩壁上,碑面高250厘米,宽280厘米,侧宽150厘米。由御史大夫崔琳率领的庞大的赴吐蕃和亲使团,于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春三月到炳灵寺。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元十九年春正月辛卯遣鸿胪卿崔琳入吐蕃聘聘”,“二月甲午以崔琳为御史大夫;三月己酉朔崔琳使于吐蕃”。

《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频遣使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陈通和之便……因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使往问吐蕃。……十八年(公元730年)名悉猎(吐蕃使者)等至京师”。《新唐书·吐蕃上》载,“敕惟明及中人张元方往聘……使名悉猎随使者入朝。”公元19年崔琳西来,就是对名悉猎的回聘。《灵岩寺记》即是崔琳等一行西去经过炳灵寺留下的。由该题记之后所留70余人的官职题名,足见当年遣蕃使团的庞大规模。因此它在研究唐王朝和吐蕃交往历史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此摩崖刻石在张维先生所著的《陇右金石录》中亦缺载。阎文儒《灵岩寺记注释》^[2]、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3],均对这方刻石做了著录及考证注释。另外,张思温先生的《积石录》,王亨通、杜斗成合著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也分别对此方石刻做了介绍。然各家录文均有出入,现仅将张思温先生在《积石录》中对这方刻石的跋文按语介绍如下。

此记摩崖刻于第148号窟外北侧。高132、宽98厘米,共30行,行43字。有方格线,每格6.3厘米,字作正楷,无书人姓名。摩崖紧临窟门,门旁镌有“灵岩寺”及藏文一长行。以“灵岩记”三字看,似与记文字体仿佛。门楣上亦刻藏文一横行,按新旧《唐书》均载崔琳使吐蕃事,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频遣使请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陈通和之便……因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充使往问吐蕃……十八年(公元730

年)名悉腊(吐蕃使者)等至京师”。(《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略同)“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遣鸿胪卿崔琳如吐蕃报聘……二月甲午,以崔琳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朔,崔琳使于吐蕃”。(《旧唐书·玄宗纪》)“七月癸丑,吐蕃请和。”(《新唐书·玄宗纪》)“九月辛未,吐蕃遣其国相论尚他碑来朝”(《旧唐书·玄宗纪》),此记年月官职悉与史合,当为崔琳出使时经此所刻。这是我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当时唐、吐蕃往来必于此渡河桥,经鄯州,过日月山,故开元以前石窟屡有题记。自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吐蕃如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陇右地尽亡。永泰、大历间(公元765年至779年)户部尚书薛景仙与吐蕃使者论泣陵来往聘问,吐蕃请境凤林关。(传在今永靖县寺沟峡“黄河飞渡”附近之阎王砭石上旧有“凤林关”刻字,1958年以修渠削去,今为水库淹没。)直至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将尚延心始以河、渭州来归,此地沦于吐蕃80余年,其间虽有信使往来,但不见刻石纪事矣。题名由使副迄僚从凡71人,皆各部、台、寺与内侍省官员,是时金城公主在蕃,又玄宗宠信宦官,故“和吐蕃使”以内侍领之。又有送使将军、司马,应率兵卒护卫,可知其规模之盛大。唐世重资荫。故从者品子、品孙甚多。辖地之节度、刺史、令、尉与寺僧五人亦列衔名于后。《新唐书·地理志》言,河州“西南四十里有平夷守捉城”。其事由刺史兼知,想见扼要。唐河州城,在今临夏州治东二里,西40里为今双城。地当三水交汇,道路四达,应在其处。诸人中惟崔琳见于史传。琳为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为崔义玄之孙,崔神庆之子。《旧唐书·崔义玄传》载其事云,“开元中,神庆子琳皆至大官,群从兄弟数十人趋奏省闕。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其上。开元、天宝间,中外族属,无缙麻之丧,其福履昌盛如此。东都私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启戟,时号‘三戟崔家’。琳位终太子少保”(《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崔义玄传》又称,“琳明政事,开元中,与高仲舒同为中书舍人。侍中宋璟亲礼之,每所访逮,尝曰‘古事问仲舒,今事问琳,尚何疑。’累迁太子少保,天宝二年卒,秘书监潘肃闻之,泫然曰:‘古遗爱也。’……初,玄宗每命相,皆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瓿。令太子入,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即中,且赐酒’太子曰:‘非崔琳愿从愿乎?’帝曰‘然。’赐太子酒。时两人有宰相相望帝欲相之屡矣,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新唐书》卷一百九)。又记文首言“钟羌不庭”,拓本“钟”字不清,惟就石审视,确然无疑。“钟羌”事见《后汉书·西羌传》。又《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东迳允川历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钟存之所居也。”其地亦与炳灵寺差近。惟开元十九年前史未纪钟羌事,应即影指吐蕃耳。

三、临洮 唐天宝 哥舒翰纪功碑

“哥舒翰纪功碑”位于临洮县县城南大街,清代狄道知州田自福曾建砖楼覆于石碑之上,此碑又系唐代碑刻,当地人因而称之为唐碑亭。又因此碑原来座落于一寺庙之内,故人们又呼其地为石碑观。碑为泥钙砂岩质,面向朝南。由于此碑石质用料结构较为疏松,且长期暴露于风吹日晒的自然环境中,易于遭受风化磨蚀,加之人为破坏,剥损十分严重。

此碑通高765厘米,分别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座由五层长条形巨石叠垒而成,通高250厘米,宽280厘米,侧宽150厘米。碑头高100厘米,宽188厘米,厚68厘米。两条盘绕透雕巨龙正中托出长方形碑额,高60厘米,宽40厘米,自右至左分两行竖刻有6个隶书大字。现仅有左侧“圣功颂”三字可以辨认,每字约15厘米见方。

此碑碑身高425厘米,宽185厘米,厚60厘米。碑文自右至左竖刻,实应17行,行60余字,隶书,每字约5厘米见方。此碑碑石由于受自然风化剥蚀的影响,加之人为破坏,近百年来碑面文字损失更为严重,目前除碑身上半部尚有少数文字可以识读之外,其余部分尤其是自30字以下均已剥落残损、片字全无,现通碑仅存78字。

此碑文字在一些方志、金石等著作中多有收录,且评价甚高。然《陇右金石录》等书很可能是由于所据是碑拓片皆非一纸全拓的影响,致使所录碑文文字上下部分错行误录。另外,《宣统甘肃通志》中言,此碑碑首有隶书“丙戌哥舒”四字,实则全无,现今碑额仅有左侧“圣功颂”三字依稀可辨。为了便于人们利用,仅据今碑全拓本将碑文以及张维先生的录文及跋文按语分别照录如下。

……

……皇之德施化 ,侔天地经纶象 ,云雷日月所临之……

远者□□□□□也憬□□夏 ,其惟犬戎 种落猖狂 ,保聚山谷 ,故圣王……

则怀□□□□□□□□□□□□□□旧章 ,特申约言 ,载锡姻好……

明德……也 ,潜通约而反间……

军士……

□意……

……

□□□工……

……

……

乃亲……

败谋……

大服小……德□□叛……

一举而定□□□□□□□也。武有七德 ,今则过之 ,而颂声无闻 ,何以……

策谋圣从……

颂曰 :……

张维先生《陇右金石录》中关于此碑之录文 :

远者(下缺十字)皇之德施化侔兀兀坠经纶象云雷日月所临之

则怀(下缺八字)也憬□□夏其惟犬戎种落猖狂保聚山谷故圣王

明德(下缺十一字)旧章特申约言载锡姻好

军士(下缺二十一字)也潜通约而反间

意

未加

身亲

败谋

大服小

一举而定(下缺十七字)德□□叛

圣策谋从(下缺十字)也武有七德今则过之而颂声无闻何以

颂曰

张维先生《陇右金石录》中关于此碑之按语“哥舒翰纪功碑”在临洮南城 ,今存。《通志金石略》“哥舒翰纪功碑”在熙州。杨应琚《据鞍录》,乾隆己未七月三日蚤行至临洮 ,赴北极观看古石碑 ,碑高两丈 ,广6尺 ,厚如广之半 ,岌岌欲坠 ,字皆剥蚀。询诸土人曰故老相传 ,文皆隶书 ,额刊兽物 ,趺列怪形 ,乃唐西平王李晟平定羌戎所建 ,然亦无可考也。

《金石萃编》“哥舒翰纪功残碑” ,前后俱缺 ,高9尺6寸3分 ,仅存广4尺5分 ,10行 ,行30字 ,隶书 ,约存百余字。可读者仅“德施化 ,侔天地经纶象 ,云雷”云云数语而已。不知所记何功 ,且不见立碑岁月。《两唐书·哥舒翰传》:翰之先 ,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 ,世居安西 ,自被召入朝 ,拜鸿胪卿 ,为陇右节度副大使 ,逾年筑神威军青海 ,与吐蕃战 ,攻破之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宝八载 ,诏翰以朔方河东 ,群牧兵10万 ,攻吐蕃石堡城 ,三日而下 ,遂以赤岭为西塞 ,开屯田 ,备军实。加特进赐赉弥渥十一载 ,加开府仪同三司 ,进封凉国公兼河西节度使。攻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 ,收黄河九曲 ,以其地置洮阳郡 ,筑神策、宛秀二军 ,进封西平郡王 ,赐音乐、田园 ,又赐一子五品官 ,裨将赏拜有差 ,其立碑纪功 ,似当即在此时。嗣后不久为天宝十四载 ,安禄山反 ,翰移兵潼关 ,战败降贼 ,不复有功于纪矣!更以《唐书·吐蕃传》证之 ,吐蕃自中宗景龙三年和

亲,金城公主下嫁,后聘使往来,国以赤岭为界,表以六大碑,刻约其上,诏张守珪分谕剑南、河西州县,自今和好,无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后未久,吐蕃乃悉众入寇,攻振武军石堡城,天宝元年战青海,明年破洪济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节度陇右,翰攻拔石堡,更号神武军,禽其相兀论样郭,又破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县,实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洮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西。后二年,苏毗子悉谨选来降,封怀义王,赐姓李氏,此是十四载事,然则此碑所纪,正是洪济、大莫门之战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谓“约君姻好”、“通约反间”等语,多与此合。碑后云,“武有七德,今则过之,而颂声无闻”,似是边将纪哥舒翰功而因以颂君德也。杜工部有《投哥舒翰》诗云,“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意亦此时所作。碑或立于天宝十二载或十四载悉诺逻来降之时,皆不可知。此碑得者绝少,昶官廨中德清宋维蕃见陕甘制府幕中,购以见贻。未详立碑所在,诸金石家多不著录,惟郑氏《通志·金石略》载此碑在熙州。

方履簑《金石萃编补正》,“哥舒翰纪功碑”,残,字八分书,存者高4尺7寸,广2尺6寸,“夏”字上有“西”字,“旧”字上两格为“斤”字,又上两格有“月支”二字也,“潜”上“宾”字,“未加”作“不加”,“身亲”作“万亲”,“口水”作“服小”也,“武”上有“力”字,“无闻”作“金闻”。

《缘督庐日记》:至狄道,伯南诸君往石碑观访得“哥舒翰纪功碑”。其高如巨屋,下半载已剥泐无字。知前得拓本,但就有字处拓之,非完本也。

《宣统甘肃通志》:“哥舒翰纪功碑”在狄道州北极观内,碑高两丈,阔6尺,厚如阔之半。首刻兽物,趺列人形,文皆隶书。仅“丙戌哥舒”四字可辨,余漫漶不可读,碑后仅存90余字,今其四字又复剥落矣。国朝知州田自福建亭覆之,因名唐碑亭。州人吴镇集剩字为《唐雅》六章,碑书八分,甚古。容城王耐谷证以所藏帖,以为明皇御笔。旧府志云,故老相传,此碑乃唐李晟平定羌戎,于此建碑,书乃哥舒翰也。但翰破羌戎天宝之时,而晟至德宗时功名始显,岂有晟立碑而翰书之理?旧志错误,不可不辨。

此碑高两丈,广6尺,今有字者6尺5寸,广3尺,拓本凡11行,而第5行无字。最后“颂曰”一行今亦无字。故《萃编》所载应为12行,其云10行,误也。12行最多者,其地位应为33字。而行首二三字下俱有10余字剥落,故今存最多之行亦不过20字。《萃编》所载上截与下截之字错列一行,《萃编补正》行列尤多错误,今以拓本正之。今有而《萃编》所无者凡3字,第一行之“者”,第9行之“服”,第10行之“一”也。《萃编》有而今无者凡28字,第一行之“皇之”行末之“之”三字,第二行“也憬”两字,第三行“旧章特申”及“锡姻好”7字,第4行“也潜通约而反间”7字,第6行“未加”两字,第10行“定”字及“德□□叛”三字,第11行“从也”两字,第12行“颂曰”两字也。又第7行“身亲”,《萃编》误作“乃亲”,第9行“小”,误作“水”。《萃编补正》之字,今惟“服”字尚存,余俱剥落矣。此碑既录于《金石略》,又有“哥舒”两字自系边人为哥舒翰纪功所作。观西鄙人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之诗,盖边人之称翰深矣。唐初置临洮军于狄道,其后始移鄯州节度衙内,故此碑立于狄道。至碑有“丙戌”两字者,“丙戌”为天宝五年,是年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拔海,所向摧靡,由是知名。明年乃擢翰陇西节度副使,盖叙其功业所自,而非树碑之年也。旧志以为李晟所立,自属讹误,又以为明皇御笔,亦无佐证,姑厥疑焉,可矣!

四、临潭县 唐代 故大将军李公之碑

此碑原在卓尼县安布足村西台地上,村民俗称之为“李将军碑”,“石碑沟”就是因此碑而得名。“文革”期间此碑曾被村民推倒,并被作为磨刀石使用,碑身上至今仍可看到当年被磨损的痕迹。70年代末,此碑被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拉回馆中,并建起碑亭,圈围铁栏予以保护至今。

该碑通高495厘米,共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两面刻。碑石用料均为粉红色细砂岩。

此碑碑座为一伏卧于汹涌波涛之上的赑屃,它坚实的脊背驮载着伟岸的石碑,兽头高昂,圆目鼓起,似乎为了弘扬一代名将的千古勋名,甘愿奉献出自己那用之不尽的神力。在这自然而巧妙的组合造型中,我们不难体察到碑石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及刻意追求的境界,亦即他力争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使前来凭吊碑主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敬畏尊崇之情的审美效果。

此碑碑头高100厘米,宽140厘米,厚48厘米。其正面雕饰为二龙戏珠悬浮祥云图案,正中托出尖首碑

额,高60厘米,宽40厘米,自右至左分三行竖刻有“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9个隶书大字。每字高15厘米,宽12厘米。其字体用笔浑厚端庄,刚劲凝重,颇具一定的书法功力。

其碑碑身高100厘米,宽140厘米,厚48厘米。碑身两侧均雕刻有藤枝花草图案,线条流畅精美,颇具关中地区唐代碑石刻工技法之风韵。碑身之正面为上录之碑文,自右至左竖刻,共30行,行70余字,均为楷体,每字约两厘米见方。此碑由于长期暴露于荒野之中,历经风雨吹袭、人为破坏,碑文剥蚀十分严重,目前除碑身上半部尚有少数文字可以识读之外,其余部分基本处于斑驳残损、片字无存的状态。正因如此,关于这方石碑的碑主及碑文书撰人姓名、碑石刻立年代等具体问题都未得其详,后世学者只能凭借碑中的残存字迹与相关史料力图解开其间的种种疑云。

此碑之碑文在《甘肃通志》《洮州厅志》《陇右金石录》等志书专著中虽有收载,然均录字颇少,讹误亦多。前有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工作的李振翼同志曾洗剔碑身,摩挲细读,获得了一个新的记录本,并以此为基础,参照史籍,反复考证,后又将其心得体会写成专文,刊载于1980年第2期的《兰州大学学报》上。本文对碑主的确切身份、石堡城的地理位置、党项拓拔氏的内附活动情况等问题均提出了有异于前人的独到看法。

1997年第2期的《陇右文博》上又刊登有《关于甘南卓尼县唐李将军碑》一文,其中不仅将碑文释录到462字,而且对此前人们关于碑主身份的考证所作的种种猜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尽管其释文及观点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碑残存不多的文字对于研究古代一些少数民族在本地区的交替演变及历史活动等诸多问题,仍不失为是一篇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张维在《陇右金石录》卷三中曾以“李将军碑”为目对此篇碑文有所介绍,现将其跋文按语转录如下。

“李将军碑”在临潭石碑沟,今存。

宣统《甘肃通志》:“李将军碑”在洮州厅旧洮堡南七里,今名石碑沟门,乃由洮往迭之通道也。碑额书“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八分书。碑高一丈五尺,广四尺。碑面通排30行,下半剥落,惟上节可辨,然亦不能句读。碑阴有元至正癸卯岁便宜总兵官兼枢密院事阿□□速氏题李将军碑后,作7行大字,楷书。其剥落处亦多,止存下半截。

《新通志稿》:此石今尚存。《洮州志》云,此李将军者,李宪也。相传原石旧拓犹可辨认。旧志载于李晟碑前,固属未当。惟考《唐书》李晟本传,西平故有多男之庆,诸郎中建牙开府者,实不乏其人。传末云晟子15人,其闻者愿、宪、塑、听云。即附四人之传于后,宪并其将军之封,证以“裴晋公碑”亦同。愿、塑最显,无论以悬为左神武大将军,凭为右威卫大将军,幕为羽林将军,而无大字。今碑额书“故大将军”,或者“宪”与“悬”音近而讹传欤?海内倘有旧拓善本,当据以校订之。

此碑正文高8尺广4尺,凡30行,行约70余字。上段略可辨,碑底亦有字两层,共20余字。而文义未能衔接,今未录入。依残字考之,李将军者,盖以击吐蕃功,自府兵折冲累官至诸卫大将军,封临潭侯,并赐国姓,其人盖在开元、天宝之际。以其时数击吐蕃,故边将多以功伐显名,授爵锡姓尤多有之。原文漏载殊多,今以拓本增正,乃知李将军即为洮州钟铭所叙之人。而此碑则立于歿后,大抵仍在天宝中叶。至广德以后,凉、陇沦陷,唐之西境北不过潘原,南不逾陇山,不惟无边功可纪,即边将如李将军之属,亦安能从容归葬,树碑故里?故西平虽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将,其卒也,仍葬高陵,况其诸子而能立石于久为蕃据之洮州之地乎?仅就碑文“大将军”三字以为李宪,又以为李悬,皆不考之甚也。

此碑阴面上下两部分分别为“宋宣和‘李将军碑’碑阴题字”、“元至正‘李将军碑’碑阴纪事”。

五、临潭县 唐代 石堡战楼颂残碑(八棱碑)

上世纪50年代未发现此碑仅存17字之残石,今存临潭县博物馆。其石碑全文原约700字,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卷二录480余字。

张彦笃修、包永昌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洮州厅志》卷二《舆地·古迹》载,“石堡城在城西南70里,今名羊巴城,半在山上,下临洮水,三面险绝,惟西南一路可通,西则石壁峭立,营迹累累,城中有八棱

石碑,系唐天宝八载所竖,碑文为《石堡城战楼颂》,意即哥舒翰攻吐蕃纪功之作。原文《金石类》(采访册)。

按《方輿纪要》云,西宁镇西南300里有石堡城,考其沿革即唐天宝八载哥舒翰所克者。又云其城三面险绝,古冢古碑至今犹存,惜无字迹,故不知其名称焉。距洮城南200余里(采访册)。

据包寿南《石堡城辨疑》^[4]，“八棱碑，碑文题名‘石堡战楼颂’。当地各族居民，因其碑形为八棱，所以称作‘八棱碑’。它建立于唐‘天宝八载(749年)秋七月二十一日’。碑用紫红色岩石作成，长六尺余，有八面，每面宽一尺左右。碑文每面五行，每行36字，因历经多年，仆地已久，碑文已剥落不全，所余部分尚收录在《洮州厅志》和《甘肃新通志》《甘肃通志稿》以及《陇右金石录》等金石、史书中。遗憾的是原碑已不在我国。那是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喜牧师利用‘传教自由’的特权，在羊八城山腰‘八棱碑’的旁边建立了一所‘福音教堂’，并贿通当地居民(耶苏教徒)周□□，将置于宅旁场地上的‘八棱碑’，于民国八年(1919年)，用棉絮包裹窃运出国，据邑人耶苏教徒牛□□反映，喜牧师曾向他亲口透露，‘八棱碑’已陈列在美国纽约博物馆，如果其它国家要拓碑文，每次需付报酬1 000美元。碑文价值所以如此之高，不只是它的年代相当久远，而且由于碑上的铭文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亲笔书写的。颜真卿的字——真正的‘颜字体’，已如凤毛麟角，很少见到了。悠久的历史加颜氏的真迹，便构成了‘八棱碑’的文物价值。”

孙显宗《也谈唐石堡城遗址》^[5]载，“1958年临潭县文化馆从羊八村收集到了被美国传教士盗去的‘八棱碑’(《石堡战楼颂》)上砍掉的一块(此块残碑仅有三面，等边八角形的角应该是135度，此残碑上的两个角都是135度，所以它就是‘八棱碑’上被砍掉的一块。)上面共存字16个，其中‘(城)郊多垒’字句正好反映了此城当时的坚固形势。”

李振翼《唐石堡城方位之我见》^[6]载，据羊八村周姓老人讲，“‘八棱碑’是他父亲周化南在山上发现的，因为不了解它的价值，被弃置于打麦场上，并将无文字的部分作了碾场用的碌碡，此后，被美国传教士以重金购去，并运往约博物馆。在此前曾有临潭人高风西打过拓片，因人故家徙不知所终。”“此碑残部是1981年重新出土问世的。残碑为细红砂岩，八面体仅存3面，残长29.5厘米，两面宽残，中间一面为17.5厘米，现3面尚存17字，并刊刻于5.5至6厘米方格之中……字体行楷相间，作风近似卓尼唐李将军碑文，风格略异，属秀俊纤丽一派。残碑形制惟与《洮州厅志》、《甘肃通志稿》和《陇右金石录》所载每面五行不符，为以三为‘五’之误。倘若如此，便以原出土之‘八棱碑’两相吻合。再如碑文中‘郊多垒’录本作‘郊垒’，两处均有‘并邑’、‘如是’等，可否说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内在的联系呢？(详细考定，以待来日。)况以上各书录本，均非著者亲赴现场考察笔录。皆因辗转抄录，难免有失误之处。否则，它则是另外一座碑刻的残部了。”

张维在《陇右金石录》卷二中以《石堡战楼颂》为目对此碑碑文亦有所介绍，现将其跋文按语转录如下。

“石堡战楼颂”在临潭羊巴城山，今佚。

《宣统甘肃通志》云，“八棱碑”在洮州厅旧洮堡河南羊巴城半山之上。碑作八面，每面5行，每行36字。惜仆地已久，故剥落不全云。《新通志稿》云，此碑剥落已多，幸碑末年号尚存，后为美国教士以重值购送纽约博物院。旧志谓其剥落不全，实则已断为二。乡人周姓筑场得之，以无字之半改为碌碡，上半字迹犹存，遂为外人所收。是每行30字之说，亦仅就现存及剥落之处计之耳。

《唐书》天宝初改州为郡，郡置太守，而洮州改为临洮郡。此碑“管公”之上当为临洮太守。唐时于洮州城内置莫门军，管兵5 500人，马200匹，地当边冲，修饬战备最为急务。石堡战楼之作，盖所以制冲突，备扼守。甚惜其残缺不完，不足证明史事。然是年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而此战楼则成于七月，预备不虞，意或在此。原碑题名“堡”上一字已泐，今依颂文题为“石堡战楼”云。

六、临潭 唐代 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铭并序

此碑今已不存。碑文为裴度撰，文存《全唐文》卷538。全文约1700字，历述李晟在今甘南等地区征战督抚之生平事迹。

据张彦笃修、包永昌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洮州厅志》卷十二《列传上·人物》载，“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人。幼孤，事母孝长，有良将才，号‘万人敌’。屡败吐蕃，讨田悦，破朱泚、李怀光等。再造唐室，

德宗有‘天生李晟,以为社稷’之感,后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拜凤翔陇右节度使。晟以乡里辞,上不允,累官司徒兼中书令,进爵西平王。薨年67岁,赠太师,谥忠武。有子15人,惟愿、愬、宪、昕,皆以勋业世其家。详见《唐史》。”

七、临潭 唐代 洮州钟铭

此钟今已不存。张维在《陇右金石录》卷二中曾以《洮州钟铭》为目对此篇钟铭有所介绍,且录铭文79字。从铭文中“石堡有若金汤”“玉成以开寿域连生”等语可知,此钟当为庆贺石堡城之战的胜利而铸。现将其跋文按语转录如下。

“洮州钟铭”在临潭文昌庙,今存。

《洮州厅志》:文昌庙钟高七尺五寸,上围一丈,下周二丈二尺,厚六寸,年代无考。清同治前尝悬之,声闻50里。其文可识者凡24行。

此钟未记年月,其铭文起止亦有错误,今依洮志录之。附近有“石堡颂”“李将军碑”,皆唐时物。钟文叙述多与“李将军碑”相同。考《唐书·吐蕃传》,天宝元年吐蕃破洪济城。八年,哥舒翰复拔洪济城,同年攻拔石堡城。当时李将军盖均身与其役,故铸钟以纪其勋绩。碑则立于歿后,原文有误字,并以碑拓正之如右。

八、华池 后唐长 兴四年 大唐之国碑记(933年)

此碑立于大唐长兴四年,碑石为粉红色砂岩质,单面刻,高235厘米,宽93厘米,厚22厘米。碑石由碑帽、碑身两部分组成。碑帽为透雕盘绕腾飞双龙,正中为高30厘米、宽20厘米之圭形碑额,其上自右至左分两行竖刻“大唐之国”四字,每字约6厘米见方。碑身为回形线条纹饰。碑文自右至左竖书,现仅残存18行,行约60字,字为楷书。此碑原在华池县林镇乡大凤川旧城子老城西口,2001年10月将碑石运回县城,现存华池县东山公园内县博物馆北侧。旧城子系指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庆历年间修筑的凤川新寨,宋之前在此寨西侧还修筑有凤川旧寨,即旧城子老城。

其碑文有:“又於乾宁二年九月日,静难军牒补野利阿胡充凤州、静羌两镇镇边使……名而千里之外,永标鳞各,论祖父野利阿胡之功勋,幼而为唐邦之荣洛保护。国朝之疆封,效大道之苦……”从中为了解当年民族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信息。

现存华池县,分别刊刻于后周显德元年(955年)及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的“静难军押衙为父母建立碑文并序碑”,均为野利阿胡后代所立,其碑文中有:“蕃无二心,命不恨训,能部兵谋,依输公道,长怀谨节。男攻书法,女教针诗。□□□□蕃志二礼,则所希公道,并准汉机,皆是前人至尊至德,遂感年年□□,岁岁加官。永不替移,誓同山岳。蕃戎怕怖,不敢欺区。各归农□,并以供输。能和蕃部,□□安民,誓不战争。枪旗戎戟,永不施张。弓剑刀锥,制为农器……”当年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等大部分地区均为“蕃汉杂处”,且吐蕃军队在退出长安后,应有大量的吐蕃民众散落于今天的平凉、庆阳等地,有今存平凉、刊刻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的“重修崆峒山寺碑”为证,因其文后又有提领凤翔府、宁州、环州、潼州、水洛县等地管酥油僧户题名职衔,由是而知当年这些地区与藏族僧众的密切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与影响。由是而知,“大唐之国碑记”应该引起藏学工作者的充分注意。

参考文献:

- [1][3] 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J].敦煌学辑刊,1989,(1).
- [2] 阎文儒.炳灵寺石窟[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 [4] 包寿南.石堡城辨疑[J].西北史地,1982,(1).
- [5] 孙显宗.也谈唐石堡城遗址[J].西北史地,1983,(2).
- [6] 李振翼.唐石堡城方位之我见[J].西北史地,1985,(2).

(下转第 188 页)

- [3] 龚耀飞. 基于项目教学模式的中职学生现代职业能力培养策略[EB/OL]. <http://www.edu.cn.net.cn>. 2007-11-28.
- [4] 孙仁玲. 基于职业能力结构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J]. 人才资源开发, 2008 (8).
- [5] 谢勇, 张来希. 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高职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6] 李乐霞. 医学物理实验课循环教学的实践与探讨[J]. 医学教育探索, 2006 (11).
- [7][13][14][15] 贾敬全. 经管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构建探析[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1 (1).
- [8][10][12][16] 厉敏萍. 对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J]. 教育探索, 2008 (11).
- [9] 王萱. 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J]. 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 2007 (3).
- [11] 刘曜, 孙玺. 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体系改革研究[J]. 民办教育研究, 2009 (1).
- [17] 张纯荣.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重构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10 (35).
- [18] 邢继岩. 对高职农学专业开放式实践教学的思考[J].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4).

(责任编辑 吴铭 责任校对 肇英杰)

(上接第 76 页)

Contents Summary of Tibetan-related Epigraphy in Tang Dynasty

Wu Jingshan, Li Yongchen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 Stud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Tour Guide Department, Hebei Tourism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e, Hebei, 067000)

[**Abstract**] The Tibetan-related bell and tablet inscriptions in Tang dynasty and Cliffside carving are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obu history. However, this has been neglected for long. The article off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se inscriptions so as to draw adequate attention of academy and help them to play their role in Tibetan studies.

[**Key words**] Gansu, tablet inscription in Tang Dynasty, inscription on bell and tablet

(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肇英杰)

声 明

本刊 2012 年第 1 期刊出的论文《曼彻斯特学派述要》(张丽梅、胡鸿保合著)系张丽梅主持的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项目批准号:11YJC850034)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